

# 鲁迅乡土小说他者视阈的迁移与阐释意义

陈少辉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摘 要:**鲁迅的乡土小说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写作的被仿式,他以西方现代思想为观照立场,构筑了用乡土发现、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乡土写作语境。

**关键词:**鲁迅;乡土小说;他者视阈

## —

乡土小说的叙事几乎都是在一种他者视阈中进行的。这是因为乡土小说出现于中国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社会结构出现革命性转型的时期。其诞生与乡土性从社会主流地位的退场有关,是城乡角逐、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冲突的结果,因而它必然成为文化冲突的表现物,负载沉重的社会历史内涵。每一个乡土小说的写作者都或隐或显地选择了一种文化立场来观照和构筑乡土世界,从而形成叙事上的他者视阈。由于观照立场的差别,乡土小说至少可以形成三个内涵侧重点:第一,乡村的、田园的,对立面为现代都市文明、工业文明;第二,地方的、地域的,对立面为中心文化、主流文化;第三,本土的、民族的,对立面为外来文化、异质文化。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几乎自诞生时起就成为以西方现代思想这个他者视阈审视中国,展示中国的落后与保守的形象代言。在包含了“疗救者”与“被疗救者”的二元对立结构中,站在“疗救者”立场对“被疗救者”进行发现、解构成为基本的写作思路。鲁迅的乡土小说无疑也遵从了这个基本思路,他深知“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sup>[1]49</sup>面对日益衰微的传统文化,欲要肩负起启蒙责任,自己就不可避免地要走“文化偏至”的道路,扮演激烈反传统的角色;鲁迅将自己在这一角色里所尽的义务称为“呐喊”。作为现代中国乡土小说写作第一人,他构筑了用乡土发现、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乡土写作语境,其乡

土小说一直被看作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写作的被仿式。

然而,鲁迅踏上新文学道路时,早已超过了青春浪漫的年龄。此时他经历了留日期壮志的寂灭和辛亥革命后希望的幻灭,于北京绍兴会馆自号“待死堂”,<sup>[2]39</sup>蛰伏了十年,满心沾染了“鬼气”与“虚无”,“一种对社会和个人的深刻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交织成他这时候的心态。”<sup>[2]47</sup>这一切使鲁迅“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sup>[2]59</sup>于是,他一面“抵抗绝望,锐意呐喊,一面又超越启蒙的呐喊,以质疑与自省的方式进入更深的对社会与个人的思考之中。这使得鲁迅常常由“疗救者”立场转到“被疗救者”立场,对被命定为民族拯救者的新文化锻造者进行反观,造成小说中他者视阈的迁移,他的乡土小说也因此具备了更丰厚的阐释意义。

## —

站在西方现代思想立场进行“呐喊”时,鲁迅采用知识分子对乡土世界自上而下的高临俯视姿态,对“被疗救者”进行揭露批判。表面看这些文本,如《明天》、《风波》、《离婚》等,都用全知视角,叙述亦

收稿日期:2008-11-05

基金项目: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资助科研项目“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形态研究”(2007qn06)

作者简介:陈少辉,女,湖南娄底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人文教育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小说研究。

颇为冷静客观。然而,在含有他者视阈的作品中,创作主体的意向性总是处在极为凸现的位置。作家基本上都有按照自我的意志、愿望和创建需要对观照对象进行主观化写作的倾向。鲁迅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很容易就看出,他对自然化的农村不感兴趣,“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sup>[3]</sup>而“文化”是他社会关注的核心。例如,鲁迅笔下的第一个村庄狼子村(《狂人日记》),历史上“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四处游走着吃人和被吃者。这个小村庄没有任何自然特征,完全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象征出现的。此后,他笔下陆续出现的鲁镇、未庄、吉光屯,也都是作为历史文化的深厚背景存在于小说之中。鲁迅基本不直接描写和修饰这些地方,即使有也是抽象概括,例如,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明天》)、吉光屯是“动一动就须查皇历的地方;对地方风俗也不详述,提到过的‘祝福’”(《故乡》、《祝福》)、“社戏”(《社戏》)都语焉不详。却将文化还原为生活形态,再现于乡民的日常行为举止中,使文化如幽灵般无所不在。而且这些文化不含任何现代理性,只有“从来便如此”的不知传自哪朝哪代的风俗与习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鲁迅大都没有给正式的名字,全以身份命名,如男子叫阿Q、赵七爷、庄木三、四叔、掌柜的、赵太爷等,女子唤单四嫂子、祥林嫂、柳妈、吴妈等,只有《离婚》中的女主人公有名字爱姑,那也是另一层悲哀的事实,暗示她被夫家抛弃的命运。男人、女人、孩子都不强调鲜明的个性,也没有深刻的属于个体的心理活动,只有长期沉淀的集体无意识和对于“从来便如此”的习俗的愚昧而顽固的坚守。他们尘芥般地存在、生活,因种种人伦关系须臾不可分割而又彼此冷漠隔阂地挨挤在一起,在昏黑的世间一一地被迫害、摧残、异化却又毫不自觉。可以说,鲁迅将凡与文化魂灵和深层意识挖掘无关的材料都进行了“悬搁”,既和乡土写作中“异域风情”的“炫耀”完全隔绝,也和鲜明的个性人物相隔离。他努力消除乡土世界的个别色彩来获得普遍意义,消除村镇的自然形态以突出文化写生身份,有极为自觉的主观选择性,小说因此具备了由乡土透视中国文化的叙事大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鲁迅的乡土小说不仅淡化了对乡土固有自然风物和乡土人物文化共性下的个体差异性,而且有意忽略掉乡土在时间上的线性推进(诸如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乡土世界的变动等);乡土成为凝滞的、静态的、高度符号化的存在,是古旧民族衰微文化的象征物,它黑暗、病苦,沉积着一个民族千年

文化的全部“鬼气”,是一个亟待变革的世界。

然而,鲁迅又是深知“人”是最关键因素的,在具体的文本中,上述文化象征物被作家外化为人物生存的文化环境,以叙事文本中的空间要素表现了出来。如《明天》开头写道:“鲁镇是僻静的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都关门睡觉。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sup>[1]450</sup>这就像电影镜头,从鲁镇的一片浓黑中选出两个正在演出故事的小空间,跟拍了给人看。单四嫂子因为担心孩子宝儿的病独坐长夜,相邻的酒馆里的人“很舒服似地喝酒唱曲,以她为谈资说暧昧下流的话。一个人的忧心、苦难在另一些人(这些人彼此熟悉,朝夕相处)眼中毫无份量,这种隔膜和冷漠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验。小说写到单四嫂子丧子后在空间上的特殊感觉,如:“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sup>[1]455</sup>写在“静和大的空虚”<sup>[1]456</sup>中的单四嫂子最终入睡了,正如咸亨酒店酒依然那样喝着,曲依然那样唱着,整个鲁镇也依然“完全落在寂静里”。小说不仅写出了一个正遭受痛苦的人,在她的环境里怎样孤独寂寞地独自吞咽自己的苦痛,还写出了这个饱受痛苦、深感被损害的人在遭遇现实苦难、领受精神创痛后,对自己精神上所受戕害的茫然与无知。鲁迅也利用空间的对比,如《风波》与《离婚》。《风波》写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几年后,皇帝又“坐了龙庭了”这样的大事,在民间居然只是让七斤家的晚餐桌上发生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辫子“风波”。实在的空间(家)和隐含空间(国)强烈对比将人与人的冷漠隔阂上升到国民与国家的隔阂。《离婚》中构成对比的是有无“七大人”的慰老爷家。“和知县换过帖”的七大人仅用一句莫名的“来兮”,就让强悍泼辣誓死不离婚的爱姑稀里糊涂地“离婚”了,可它和带来“离婚”观念的自由平等新思想的距离又是多么遥远!

周作人曾点破说,《明天》“只是著者的一个思想借着故事写了出来”,<sup>[4]</sup>这里所说的“思想”就是鲁迅极为关注的个体的人和一种文化的相依相生关系问题,《祝福》、《阿Q正传》中“祥林嫂和鲁镇”、“阿Q和未庄”的关系都属于这个问题。沿此发展,“疗救者”在“被疗救者”个人主体精神觉醒上应尽和能尽的责任问题必然成为鲁迅考量的对象。

## 三

1919年12月,鲁迅回到阔别近八年之久的故乡,售卖祖屋,举家北迁。1921年,他以这一段经历为蓝本,写下了小说《故乡》。在这篇小说里,鲁迅设置了一个全新的人物——“我”,此后,《阿Q正传》《社戏》《祝福》中都保留了这一人物。人物“我”有固定的身份——经受现代西方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出现于特定的情境——离乡日久后又得以重新接触或忆及故乡的人事,并参与进了小说的人事关系。如《阿Q正传》中“我”是立传人,《故乡》中我是“还乡者”,《祝福》中“我”是祥林嫂悲剧的参与者。在“疗救者”和“被疗救者”关系中,“我”的出现形成了“被疗救者”对“疗救者”的观照,并最终导致了鲁迅乡土小说他者视阈的迁移。王晓明认为,《祝福》是鲁迅用小说的手段进行自我分析的开始,笔者认为应始自《故乡》。然而“我”的设置,虽然出自鲁迅个人经历的一次提炼,但超出了对个人处境的自察自省,开启了对一直担纲启蒙重任并被寄予了疗救厚望的现代知识分子拷问,追寻“我”在鲁迅乡土小说中的行进轨迹,可发现这场世纪拷问肇始于自命“启蒙者”乃至“疗救者”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乡土中国的再发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自我身份的再认识,结束于对现代知识分子于疗救中“缺席”的洞察。在这个意义上,书写“还乡”经历的《故乡》和将“疗救者”与“被疗救者”直接联系的《祝福》最能代表鲁迅乡土小说他者视阈迁移所带来的新的阐释意义。

《故乡》写“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的一次“还乡”经历。这次“还乡”的目的是卖掉多年聚族而居的祖屋,彻底斩断和故乡的最后一丝现实联系。所以,从现实层面来看它是一次“还乡”,从心理层面来说却是永久的“离乡”。如果说昔日走出故乡寻找别样人生的“离乡”因个人困境,对故乡的认识还很朦胧,还更多地停留在情感眷恋(或厌恶)层面;那么现在以城市侨居者身份、游子面目,或许竟然是曾经沐浴新文化思想甚至留学海外向现代西方“盗取”思想火种的新知识分子身份归来故乡的“我”,已经和故乡产生了深深的隔膜。然而,凭借和乡土世界的心理距离,“我”反而获得了对故乡的俯视和再发现。文本利用“我”这种特殊的情境和心境,将故乡的过去与现

在结合在一起。联系过去的是情感的眷恋,它来自童年的故乡生活经验,带着以童真的眼光看来的一切美丽温馨,天真、甜美如童话梦境;联系现在的是理性审视的眼光,它一眼就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农村在经济上面临破产的萧索荒芜,看到了故乡的人比政治经济的落后更可怕的精神上的麻木僵滞,以及由此带来的“我”——这个故乡走出的新人——和留在故地的人之间深深的精神鸿沟,在痛苦的理性体认中,建立于“我”童真记忆基础上的对乡土的眷恋情感在逐渐被消解。于是,经由“还乡”,“我”完成了对故乡的再发现,作品写道: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sup>[1]485</sup>

这次再发现冲击了“我”对故乡的情感眷恋,逼迫已在现实身份上脱离乡土的“我”对传统中国做痛苦的心理与情感的分离。在现代知识分子离“乡”入“城”,接受城市文明和新文化的人格成长历程中,这样的分离意味着知识分子实现了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最终确认。“我”不再是单纯的现代西方理性的代言人,也不再是情感与理智分裂的由“传统”而“现代”的过渡性知识分子的代表,而是在回看传统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对“传统”与“现代”的对照性体验后作出了身份确认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正遭遇心理上“无家”,文化上“无根”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还乡”经历形象地揭示了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内化的完成。鲁迅的深刻在于,他并没有停留于这一感性层面,他认识到“无家”只是知识分子的情感缺憾,“无根”将使知识分子面临无比尴尬的处境:因为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以唤醒“人”——生活于乡土这片广阔大地上的国民群体——为己任,却在现实处境、情感精神、文化意识三方面都和他们隔着厚厚的障壁,振臂高呼不但不能得到应者,甚至可能不会对“从昏睡入死灭”的人有任何扰动。鲁迅对被命定肩负文化启蒙和“疗救”任务的现代知识分子承担历史重任的可能性发生了质疑。

《祝福》沿着质疑继续推进,毫不留情地揭出“无根”的知识分子自身孱弱无能,无力承担责任的事实。在小说摆出的“祥林嫂与鲁镇”,“我与鲁镇”和“我与祥林嫂”<sup>[5]</sup>的三重关系中,“我与鲁镇”延续鲁迅对《故乡》中“我”的认识的。此时“我在故乡

已经没有了家,甚至连落脚点也没有一个,尴尬地寄住在鲁镇的权力话语者鲁四叔家;深知自己已与闭塞落后的故乡格格不入,因此步步小心、时时在意;在感情上对鲁四叔所代表的一切文化意识都非常反感,态度却模模糊糊畏缩只求忍耐与逃避;为祥林嫂的死深感不安却又一再地自我排遣、自求解脱……所有这些都显示,已经在认识上完成对西方现代思想内化的“我”,并没有成长为被命定的“疗救者”。“祥林嫂与鲁镇”部分,写一个失去“妻”、“母”身份的女子争取新的生存空间的努力。这样的生存斗争从一开始就是肉身和文化双重的,二者缺一不可。但祥林嫂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自觉地遵从旧的文化制度,努力把自己纳入当时主流的社会伦理道德范畴。然而藉“仆”的身份获得容留的祥林嫂始终得不到鲁镇的文化接纳,最终在饱受精神摧残后悲惨地死去。作者借“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重申“文化吃人”主题的同时,提出了谁才是祥林嫂生存斗争的助手的问题。如果说因容留祥林嫂,四婶一度充任过“助手”的话,随着祥林嫂因物用价值的丧失而被遗弃,四婶所承担的“助手”的席位,也就成为的一个“空缺”。小说总是将祥林嫂生存斗争中的双重需要交缠在一起叙述的,她的每一丝活力的丧失(也是每一次物用价值的流失)都肇因于精神的折磨,文本由此在结构层提出了祥林嫂生存斗争所需要的实际上是“文化助手”的问题。至此,小说开头“我”与祥林嫂的那一场颇具隐喻性的邂逅,可以还原为,“我”是祥林嫂无意识地寻找到的“文化助手”,是祥林嫂希望能帮助自己解决“灵魂问题”的现代知识分子。小说“我和祥林嫂”的关系是“疗救者”对“被疗救者”历史责任的形象写照,但“我”面对这样的历史责任选择了逃避,造成了文化

助手的最终“缺席”。这正是鲁迅对知识分子完成历史重任能力的最终考定。

在鲁迅看来,现代知识分子在改造国民性、拯救国民的个体精神中所应承担的就是“文化助手”的角色,但他们最终是否真正有勇气、有魄力做到这一点,还有待证明。鲁迅乡土小说中的“我”及他随之写作的《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都产生于鲁迅对自身乃至整个一代知识分子冷峻无情的审视与批判,表现了非常可贵的自省精神和无比深刻的思想认识。他的乡土小说经由对旧的文化制度的揭批,最终到达对新文化锻造者的审视,其乡土小说的整体创作因此具备了浓重的文化忧患感,达到了文化批判的最高成就,成为批判性乡土小说的范本。作为现代第一个大力写作乡土小说的作家,鲁迅因此完成了对中国乡土写作的现代超越:不是高唱“田园将芜胡不归”,也不仅是发现、解构、批判,还有对发现者的发现,对解构者的解构。

#### 参考文献:

-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王晓明.鲁迅传:无法直面的人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 [3] 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M]//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7.
- [4] 周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之一六·何小仙[M]//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35.
- [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3.

(责任编辑:李珂)